

澳門本地教材的校本實踐邏輯與模式

邵艷菊 楊潔

【摘要】澳門本地教材的編訂是解決澳門特區長久以來“自由制”教科書制度的一種課程改革嘗試。隨着近年本地教材逐漸被不同類型的學校選用，其在日常教學過程中的校本實踐模式非常值得探討。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的方法，在兩所社團學校和兩所教會學校中展開實證調查，分別與使用《品德與公民》和《歷史》本地教材課本的任課教師進行深度訪談，探討本地教材在日常教學過程中的實踐邏輯與模式。基於對訪談內容的主題編碼分析，得到四個方面的研究發現：（1）本地教材在日常教學過程中呈現出一系列校本化的實踐模式；（2）本地教材轉向校本課程的過程中遭遇一系列實踐困難；（3）本地教材在使用過程中折射出需要貼近學生生活的實踐經驗；（4）本地教材的教科書角色表現為主導抑或參考兩種定位。

【關鍵詞】澳門 本地教材 校本實踐

一直以來，澳門特區多元化的辦學主體以及私立學校林立的辦學格局，使得澳門的中小學在教材選用方面呈現出“自由制”的教科書制度。來自中國不同地區的教科書，無論是內地還是港台地區，紛紛被不同的學校採納，這也促成了一個依賴型的教科書市場。^①以往，在教科書的問題上，政府始終處於有限介入的狀態，沒有發揮行政主導的職能。^②隨着2006年《澳門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第9/2006號法律）的頒佈，取代原澳葡政府於1991年制定的《澳門教育制度》（第11/91/M號法律），在保持私立學校辦學自主和行政自治的前提下，特區政府進一步明確其行政主導角色。^③伴隨着澳門特區課程框架（第15/2014號行政法規《本地學制正規教育課程框架》）和學生須達到“基本學力要求”（第10/2015號行政法規《本地學制正規教育基本學力要求》）的逐步制訂與實施，符合澳門教育本土特色的校本課程和本地教材亟待出現。^④自2007年開始，澳門特區政府教育暨青年局與人民教育出版社聯合編寫並出版了一系列本地教材。其中，以小學、初中、高中三

作者簡介：邵艷菊，澳門城市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助理教授；楊潔，澳門城市大學教育學院碩士生。

① 單文經、黃素君、宋明娟：《三十年來澳門地區課程政策的理論反思》，《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重慶）2009年第4期，第75—84頁。

② 郭曉明：《論政府對澳門教科書事務的有限介入》，《全球教育展望》（上海）2005年第7期，第77—80頁。

③ 朱鵬：《延續與創新：澳門〈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述評》，《全球教育展望》（上海）2007年第9期，第84—88頁。

④ 蘇朝暉、梁勵、王敏：《澳門課程改革的背景、取向與展望》，《全球教育展望》（上海）2009年第5期，第55—66頁。

個階段的《品德與公民》教材學校選用率最高；其次為初中、高中兩個階段的《歷史》教材。在本地教科書編訂的過程中，政府以行政主導的角色，以“行政吸納政治”的策略，通過編審小組的多元參與，使得一線教師與學科專家的聲音共融，促使不同類型的學校代表之間達成求同存異的共識，使本地教材得以問世，並逐漸被接受和採納。^①

目前，關於澳門本地教材的研究大多集中於《品德與公民》教科書的文本分析，並且主要集中於分析教材的內容結構和基本特點兩個方面。僅有非常少的研究在實踐層面探討本地教材的教學困境。^② 因此，本地教材在應用層面的實踐探究依然呈現出一定的研究空白。本研究期冀通過個案研究的方法，對正在使用本地教材的學校展開實證調查，探討澳門本地教材在不同類型學校的校本實踐邏輯與模式。

一、研究現狀：聚焦《品德與公民》教材文本

澳門特區政府教育暨青年局與人民教育出版社從2007年開始編寫教材《品德與公民》。^③ 迄今為止，十二年間不斷修訂，成為影響面最廣、覆蓋率最高的本地教材。除此之外，教育暨青年局還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共同編制了中學《歷史》和《澳門地理》，^④ 並與廣東教育出版社聯合編寫了《中學語文》，^⑤ 還與澳門科學技術協進會共同編寫了小學《常識》，^⑥ 與澳門筆會共同編制了《書寫我城》。^⑦ 現階段，關於澳門本地教材的相關研究，主要聚焦在《品德與公民》教材，集中探討其內容結構和基本特點。

在內容結構方面，馬東影與施兩丹論述了《品德與公民》內容結構與“基本學力要求”的總體對應情況。^⑧ 李超民與莫麗勤分析了高三年級《品德與公民》教材的整體結構、直線式與螺旋式統一的內容結構、主題敘述式和案例探究式並存的編寫方式。^⑨ 范冰川與陳香則按小學、中學不同階段介紹了教材的內容結構與框架體系，以及各階段的學力要求。^⑩ 李超民與曾海輝論述了《法治生活》模組每個單元的內容、聯繫與教學目的。^⑪ 黃素君、黃樂源與謝均才通過對2016小學《品德與公民》課本進行文本分析，探討公民身分和公民

① 郭曉明：《行政吸納政治——回歸祖國以來澳門本地教材開發中的政治衝突與出路》，《湖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報》（長沙）2018年第2期，第60—66頁。

② 袁金淑：《淺析澳門私立中學品德與公民科的教學困境》，《行政》（澳門）2019年第1期，第47—59頁。

③ 《品德與公民》小學、初中、高中試用版分別於2008年、2009年、2010年出版，修訂版分別於2016年、2018年、2019年出版。

④ 中學《歷史》於2019年出版，《澳門地理》於2015年出版。

⑤ 《中國語文》小學教材於2019年出版，初中及高中於2018年開始編寫。

⑥ 小學《常識》於2018年出版。

⑦ 《寫書我城》於2015年出版。

⑧ 馬東影、施兩丹：《澳門〈品德與公民〉教科書設計研究：“自我發展”的視角》，《全球教育展望》（上海）2018年第3期，第89—97頁。

⑨ 李超民、莫麗勤：《澳門高三年級〈品德與公民〉教材內容、結構及特點》，《青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西寧）2018年第2期，第146—152頁。

⑩ 范冰川、陳香：《澳門中小學〈品德與公民〉教材的結構和特點》，《青年學報》（上海）2015年第3期，第37—42頁。

⑪ 李超民、曾海輝：《澳門“品德與公民”課程教材分析——以〈法治生活〉教學模塊為例》，《教育與教學研究》（成都）2017年第10期，第96—101頁。

意識的內容在教科書中的呈現。^①

在基本特點方面，李超民與莫麗勤將《品德與公民》總結為四個特點：教材內容與設計理念多元化、生活邏輯與學科邏輯緊密結合、澳門地域文化色彩濃厚、全方位培養開放性思維。^② 范冰川與陳香將《品德與公民》歸納出五個基本特點，即體現各階段層次重點、以學生為本、活動內容化、突顯澳門特色、拓寬國際視野。^③ 李超民與曾海輝概括了《法治生活》模組系統完整、案例豐富、生活性強的三個基本特點。^④

綜上所述，目前關於澳門校本教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科書分析的層面，“就教材談教材”，關注文本之餘缺乏對應用層面的實踐探究。但是，新教材的實施狀況、適用程度、教學感受等，並非教材理念與內容可以決定的。在推行過程中，每一位實踐者，無論是負責制定教學大綱的教師還是在課堂上進行教學的教師，他們的教學體驗和實踐回饋才是教材不斷修訂改進的切實原因和真正動力，也是本文旨在聚焦的研究問題。

二、研究方法

(一) 研究個案學校

為了深入瞭解澳門本地教材在學校中的實施情況，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的方法，實地走訪了多間選用本地教材的私立學校，對使用本地教材的教師進行深度訪談。訪談對象主要集中在使用《品德與公民》和《歷史》本地教材課本的任課教師。

由於採用目的性分層抽樣的方式，本研究的4所個案學校中，有2所社團學校、2所教會學校。此外，社團學校中有1所日校和1所夜校，每所學校參與訪談者不盡相同。為了保護訪談參與者的個人隱私，參與訪談的老師均被賦予代碼標記（A/B/C/D代表學校，H代表主任，T代表老師），詳細構成情況如下（表1）：

表1 個案學校與訪談參與者基本資訊

學校	類型		訪談參與者	備註
學校 A	社團學校 (私立)	夜校	主任 2 人 (HA1; HA2) 教師 1 人 (TA)	TA：任教歷史科（初一至高三），兼教品德與公民科（高中）；並負責制訂所在年級品德與公民科教學大綱。
學校 B	社團學校 (私立)	日校	教師 1 人 (TB)	TB：任教歷史科（初一至高三），兼教品德與公民科（高中）；並負責制訂所在年級品德與公民科教學大綱。
學校 C	教會學校 (私立)	日校	主任 1 人 (HC) 教師 2 人 (TC1; TC2)	TC1：負責制訂高中部品德與公民科教學大綱。TC2：任教歷史科（初一及其他年級）。
學校 D	教會學校 (私立)	日校	教師 2 人 (TD1; TD2)	TD1：任教初中品德與公民科。TD2：任教歷史科（初一及其他年級）。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① 黃素君、黃樂源、謝均才：《公民身分與意識初探：澳門小學〈品德與公民〉教科書分析》，《教育學報》（香港）2018年第2期，第67—86頁。

② 李超民、莫麗勤：《澳門高三年級〈品德與公民〉教材內容、結構及特點》，《青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西寧）2018年第2期，第146—152頁。

③ 范冰川、陳香：《澳門中小學〈品德與公民〉教材的結構和特點》，《青年學報》（上海）2015年第3期，第37—42頁。

④ 李超民、曾海輝：《澳門“品德與公民”課程教材分析——以〈法治生活〉教學模塊為例》，《教育與教學研究》（成都）2017年第10期，第96—101頁。

（二）研究過程與訪談提綱

為了更好地聆聽一線教師使用本地教材的教學體驗，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根據半結構訪談提綱提出一些開放性的問題，並告知被訪老師沒有固定答案，更沒有標準答案。除此之外，本次調研全程無錄音，只通過紙筆對訪談內容進行記錄，以消除參與訪談老師的後顧之憂。

具體的訪談提綱涵蓋以下三個維度的問題：第一，本地教材的校本應用。下設基本情況和教學團隊兩個子維度，主要包括個案學校選取了哪些本地教材、與之前教材的不同、本地教材的特點及整體感受、任教教師的構成情況、教學大綱的制定以及教學時數的安排等具體訪談問題。第二，本地教材的教學實踐。下設教學困難、備課研討與任教科目三個子維度，主要包括實際教學中的困難、難以駕馭的內容、採用的備課機制、參與學科進修、學生喜愛的主題、倍感挑戰的主題、實際教學模式、本地文化與地域元素等具體訪談問題。第三，本地教材的未來走向。下設經驗累積和未來沿用兩個維度，主要包括教學經驗的累積、本地教材的優劣勢考慮、考慮沿用的因素以及修訂的建議等具體訪談問題。

（三）訪談資料整理與分析

由於在本研究的訪談過程中僅進行紙筆記錄，沒有同步錄音，因此，為了防止記憶問題而引發的效度“失真”問題，^① 研究者在每次訪談結束後都立即補充、核對訪談記錄，以保證最大限度地還原訪談情境，確保訪談內容的準確性。與此同時，及時地對訪談資料進行初步整理。

在此基礎上，每個個案學校的訪談完成後，都盡量提取有用資訊，分別形成多個有效的副文本。並且，在副文本中尋找有意義的本土概念進行登錄，以此形成該個案學校的主題化編碼。接下來，對四所個案學校的主題化編碼進行橫向比較，歸納出可以回答研究問題的主題序列，並加以命名：本地教材的日常教學、本地教材的實踐困難、本地教材的實踐經驗、本地教材的角色定位。最後，對其內部涵義進行描述及分析，得出研究結論。

三、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本地教材的日常教學：校本化模式

儘管《品德與公民》課本（中學階段）的本地教科書自2008年已經開始試用，但是其修訂版在過去的兩三年才完成，因此，參與本研究的個案學校在公民教育及愛國愛澳教育方面，均呈現出一系列校本化的實踐模式。具體地說，分別體現在教學團隊、備課模式、教學模式和課時安排四個方面上。與此同時，由於《歷史》課本的本地教材剛剛試用不久，其日常教學尚未形成特定的實踐模式，基本取決於授課教師的教學安排。

（1）誰來任教？

在參與本研究的4所個案學校中，《品德與公民》課本的教學團隊基本呈現三種模式：班主任任教、某一學科背景的教師任教以及專門的行政職務教師任教。首先，因學校規模不是很大，學校A由班主任講授品德與公民科。學校B和學校D則主要由某一學科背景的教師講授品德與公民科。相比而言，學校C則在初中部和高中部設有不同的安排，即初中

^① 陳向明：《社會科學質的研究》，台北：五南出版社，2009年，第541—544頁。

為專門的行政職務教師任教，而高中部由班主任任教。與品德與公民科不同的是，參與本研究的4所個案學校，歷史科均由專門的歷史老師任教，呈現專科專教的局面。

HA1：我們沒有專門的公民老師，只能是班主任教，因為老師背景不同，像理科老師會理解不同。

TB：甚麼學科背景都有，主要是語文、歷史、地理老師。

TD1：我們學校還是非專科專教，儘量文科老師，但也有體育老師教的情況。

HC：我們和別校不同，沒有聘專門老師，高中是班主任教，老師會結合人教版和學生情況，如果不結合學生情況，不切實際。初中、初一是XX主任，初二XX老師，初三
XX主任。

(2) 怎樣備課？

在參與本研究的4所個案學校中，品德與公民科的備課模式基本呈現兩種模式：第一，一人備課、年級共用；第二，擬定主題，各自備課。首先，學校A、學校B和學校C的高中部，基本上都採用第一種備課模式。由一位負責備課的老師擬定教學大綱，之後與班主任或負責教學的教師分享。學校C的初中部和學校D基本上採用第二種備課模式，即各位老師只在教學專題上達成共識，然後各自準備教學材料。歷史科方面，由於是專科專教的教學團隊，備課方面基本上採用集體討論後各自備課的模式。

HA2：公民與品德科是同一級中一個老師備課，班主任任教，大家也會集體備課，討論一下。

TB：最多一個年級一起備課，同一個年級一個人做，沒辦法，18節課在這。高二是我搭檔備，高一我備完給他看。

TC1：在開學之前，會跟德育主任商討主題，我負責高中，會編品德與公民科的課堂使用教材，給高中每個班班主任。

TD1：基本上我們是各自備課的，開學定好主題，大家達成共識，然後各自準備，中間會在月會討論教學中的問題，再一起商量。

(3) 怎樣教學？

在參與本研究的個案學校中，品德與公民科呈現出多元化的教學模式。學校A會邀請業界專業人士進課堂，圍繞某個專題與學生進行分享；學校C與學校D的老師都提到微電影、話劇、辯論、街訪等多元形式開展教學。

HA1：公民與品德科，訓導處會邀請專業人士講，比如講毒品犯罪，每學年預設專題，請專家講，作為補充形式。

TC1：主題定下來之後，會配合主題在網絡上找微電影，用微電影結合議題，同學生討論，把主題多元地和學生學習。

TD1：多元化的議題，話劇、討論、辯論、街訪等多元化的形式。

(4) 課時安排？

在參與本研究的個案學校中，品德與公民科的課時安排呈現出固定課時、彈性補充的模式。每個個案學校基本都是初中每週1節公民課，高中每週2節公民課。其中，學校B採用留空課堂的形式，作為公民課教學時數的補充。如果沒有考試的教學周，可以實現每週3至4節公民教育課。老師們紛紛表示，緊張的課時安排，加大了公民課的專題授課難度。

HA2：高中一周有2節課，不重要、難懂的部分就放一旁，跳過去。

TB：教學課時不夠，初中歷史一周兩節課，還要抓複習、背書、還剩下甚麼時間。高中必修一節，下課了只能讓他們自己去看。

(二) 本地教材的實踐困難：轉向校本課程

在本地教材轉向校本課程的過程中，老師們紛紛提到不同的實踐困難。其中，三個頻繁出現的高頻詞，依次為：“配套”、“斷層”、和“本土語言”。

(1) “配套”缺失

對於《品德與公民》課而言，“配套”缺失意味着老師們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尋找授課所需要的資料，有時是一段時事視頻，有時是一張新聞圖片。

TD1：配套少一些，沒有資源庫，備課要用很多時間，但是，我不想學生不聽課，所以就努力看新聞，融入課堂。有時，選用貼近本地的內容，如家庭主題，用父母相片、家人相片，進行教學。

對於《歷史》課而言，“配套”缺失，則意味更為嚴峻的問題。本次個案研究中的不少歷史老師紛紛分享到，“配套”缺失為教學內容的釐定和考試難度的把握帶來了極大的挑戰。

TA：歷史是不變的，一樣教。本地教材世界史有的部分只有三四行，講不明白，需要自己找資料，本地教材沒有提供PPT。初中用的香港教材比較完整，有輔助資料等，性價比比較高。本地教材困難一些，比如古代史、現代史、世界史，一周兩次課，量大教不完，沒有輔助材料，現在是試行版，大概3年之後有修訂。

TB：沒配套的練習，得老師自己做。我和搭檔一個人出，另一個人給意見。我算是課組長，如果卷子太難，成績出來了，再檢討怎麼回事。

TD2：新本本地教材不如香港版教材好用，配套不足，只有教師用書。香港教材會配套作業紙、測試卷、PPT、圖片、影片等。

(2) 知識斷層

知識斷層或斷裂的問題，是縈繞着歷史老師的第二個主要困境。由於個案學校中的歷史老師均為專科專教的情況，因此，從教學的視角來看，新本本地教材的知識斷層割裂了老師本身的“教學線”。

TA：最困難的是世界史，學生沒基礎，有的學生聽不懂，學生程度、背景不同，我就只能從中間、簡單一點教，看學生程度來出卷子。古代史朝代很短，無法鞏固；相對而言，現代史太多，政治層面的內容過多，學生不喜歡。整理來說，打亂了原本的歷史教學線。

TD2：前兩年推出了基本學力要求，古代史少，近現代史會讓學生更有參與感、歸屬感，這個操作並不容易，新教材量太大了，老師會減去、忽略一些內容。

(3) 話語隔閡

話語的隔閡，既體現在教材中理論性或制度性語言的難於理解，也體現在不同社會文化背景而造成的文化差異上。無論是哪種情況，本地教材中話語的隔閡都對老師們的課堂教學帶來很大的挑戰。

TA：教材內容太多理論化，與學生距離很遠，如“生涯規劃”的教材內容，全都是理論，學生很難懂，也不感興趣，只能自己找材料，幫助學生消化。

TB：《基本法》的教學，有些難，枯燥，講不清楚，有時候就讓學生背。

TC1：《基本法》和憲法部分不太好教，高中是寫好校本課程的大綱，讓班主任去教，

班主任在教的時候可能出現偏差。有時感覺《基本法》和憲法的內容會硬邦邦的。

TD2:本地教材讓學生自己看,不易看懂,圖也不可愛,會出現“階級”這種詞,對中小孩來說太難了。這種時候就需要老師來解釋,或者不重要就捨棄。

(三)本地教材的實踐經驗:貼近學生生活

在克服上述本地教材的教學困境中,品德與公民科及歷史科的老師,不約而同地提到一個共有的主題,即“貼近學生的生活”。在此,作為本地教材的實踐經驗,貼近學生的生活意味着兩種實踐取向:一方面,在教學過程中的本地化;另一方面,在教學過程中的本校化。

(1)本地化

本地教材的本地化,既涉及國情區情教育等宏大議題的教學,也涉及澳門本土文化相關的日常議題的教學。無論是品德與公民科,還是歷史科,在這兩方面,如果可以貼近學生的日常生活,則可以達致師生之間的積極對話。

TA:《基本法》的議題,比較貼近成人學習者的生活,所以大家還是很關心。

TB:關於澳門社會的基本禮貌、大家的日常生活、如何尊重他人、自我認知等內容,都比較好教,學生比較喜歡。

TD1:我在教國情區情的時候,就想怎麼教呢,就問學生,澳門的區旗甚麼顏色,他們說綠色,那麼澳門的區旗就是澳門綠,中國的國旗是紅色,就是中國紅,大家去找找看,澳門綠和中國紅分別是哪兩種顏色?

TA:其實我的教學中,有一條教學線,世界史、中國史、澳門史。其中,澳門歷史,學生很喜歡。例如,鴉片戰爭時的澳門是甚麼樣的?黑沙四五百年前甚麼人居住?

TD2:在以往的教學中,我自己會加入澳門史,比如明朝時澳門城市的出現、鴉片戰爭與賭權開放、二戰時澳門的特殊性等問題。

(2)本校化

本地教材的本校化,可以從學校文化的層面,加強學生對知識點的探索過程,更加真實地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TC1:參考主題,一半是這本書,一半是以前的教學經驗,跟我們學校有關的,比如今年建校XX年,那麼就可以開展愛校專題,讓學生去查閱學校的發展歷程。

TC2:歷史教學中,加上學校歷史,比如我們學校是清朝洋務運動開始辦的,那麼,為甚麼在洋務運動時期開辦這樣一所教會學校?讓學生自發去查資料,來瞭解學校的歷史。

(四)本地教材的角色定位:主導抑或參考

在上述分析過程中,可以比較清晰地看到:對於品德與公民科而言,已經走到修訂版階段的本地教材在4所個案學校的日常教學中都處於主導的角色定位。與之相反,對於專科專教的歷史科而言,剛剛試行的本地教材在4所個案學校的日常教學中,都處於參考的角色定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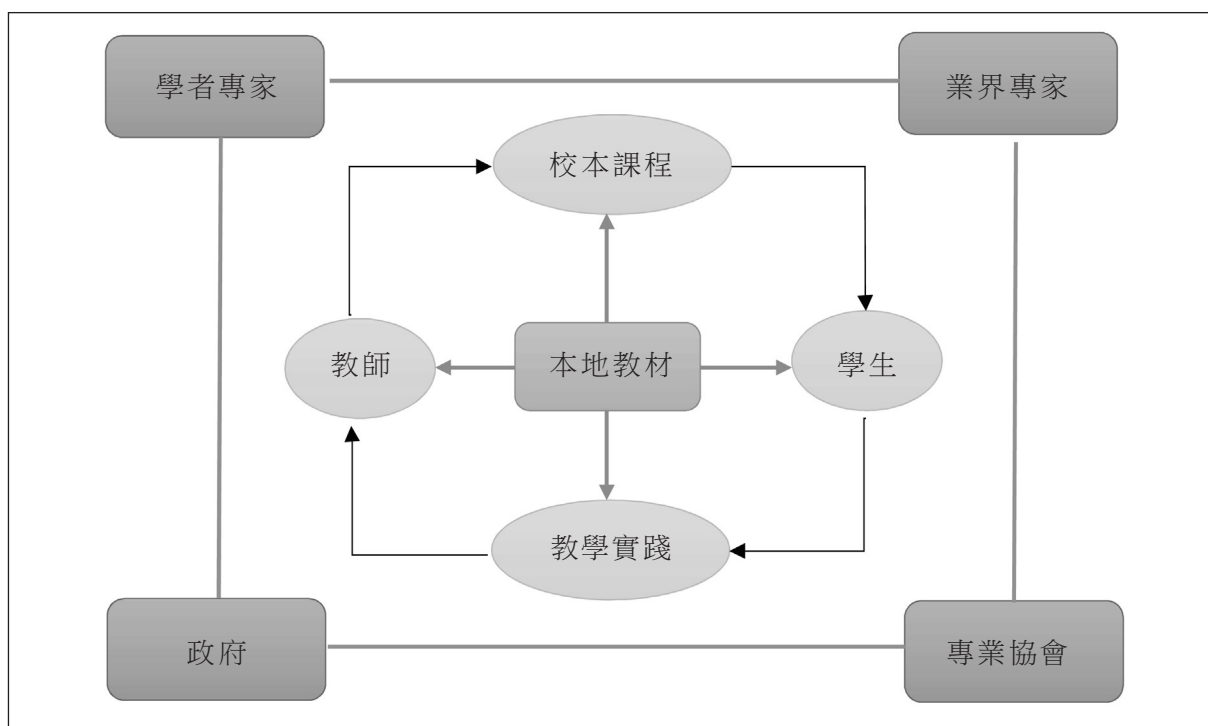
(五)討論分析

基於以上分析,澳門本地教材在校本實踐過程中,折射出其特有的實踐邏輯以及內在與外在實踐模式(圖1)。首先,本地教材的任課教師對本地教材的實踐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作為本地教材的詮釋者、校本課程的執行者,他們營造的課堂氛圍、輸出的教學內容、

展現的教學策略共同解讀了本地教材、構建了校本課程。尤其在面臨“配套缺失”、“知識斷層”、“話語隔閡”的重重困境下，教師的教學能動性以“本地化”和“本校化”的方式，努力促成本地教材教學目標的達成。而學生對課程、對教材的理解，又在課上課下的師生互動中直接回饋給任課教師。

其次，在澳門本地教材走向校本課程的實踐過程中，彰顯出特有的外在機制。以往的研究表明，校本課程實踐需要政府的投入、社區與家長的支持、專家的指引。^① 在本個案研究中，則體現為政府、學者、業者（業界精英）以及專業團體的聯合支持。一方面，教育暨青年局邀請特定領域的學者開展教師培訓活動，提升一線教師的學科素養。另一方面，澳門相關專業協會的業界專家，也會受邀走進中小學課堂。這不僅為校本課程增添趣味性，更讓課程內容貼近學生的社會生活，更大意義上促成“本地化”的實現。

圖 1 澳門本地教材的實踐模式



圖片來源：作者自製。

① 謝翌、劉偉榮：《關於校本課程實踐的反思——基於江西省“校本課程實踐總結”的研究》，《課程、教材、教法》（北京）2012年第10期，第3—13頁。

四、結語

本文通過對4所學校《品德與公民》及《歷史》本地教材的使用情況開展個案研究，獲悉本地教材在實踐層面的校本化模式、實踐困難、實踐經驗以及角色定位。在本研究中，充滿教學實踐智慧的品德與公民科教師，與以往研究中所建構的弱勢的品德與公民科教師形象略有不同。^①但不容忽視的問題在於，輔助教學材料的缺失、知識的斷層以及教科書話語的隔閡，對於課時有限且有可能非專科專教的任課教師而言，無疑形成了難以逾越的困難。參與本研究的一線教師，都希冀政府提供進一步有效的外部支持及教學指引，可以讓本地教材在教學過程中落地生根。

事實上，澳門校本課程的發展與變遷一直被學者關注。例如，擁有高度辦學自主權的私立學校，可以做到真的校本麼？會不會在升學壓力下，將“校本”演變為“效本”？^②本地教材的校本實踐，如何可以做到真正的校本？這成為阻礙澳門校本課程健康發展的核心問題之一。如果目前這一系列本地教材可以理解為校本課程的話，那麼，本研究所涉及的品德與公民與歷史兩科老師們就是在沿着本地化和本校化兩個方向，作出了許多積極而有效的嘗試。這無疑是突破校本之形式而達至校本之實質的一種切實地努力。

致謝：本研究在調查研過程中得到了澳門商訓夜中學、澳門培正中學、澳門海星中學、澳門婦聯學校、氹仔坊眾學校、澳門勞工子弟學校、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排名不分先後）的鼎力支持，在此表示真摯感謝。

[責任編輯 陳超敏]

① 袁金淑：《淺析澳門私立中學品德與公民科的教學困境》，《行政》（澳門）2019年第1期，第47—59頁。

② 黃素君、吳娟：《澳門教育革新之路——淺析澳門校本課程的發展》，《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重慶）2010年第2期，第80—83頁。